

## 论我国农村微观构造与宏观调控的改革目标问题

许 经 勇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时间。如何把这一改革继续引向深入，是当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与目标的问题。我认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包括两个方面：即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与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而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应当表现在：农民将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变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指令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村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与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从一方面来看，如果绕开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孤立地进行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这是因为，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为的是使每一个承包户都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对市场供求关系与价格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市场主体。没有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谈不上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明确而独立的所有权，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自由而又平等的商品交换，是市场机制赖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只有使作为农村经济细胞的农户，真正地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权、责、利的

统一，才有可能对市场信息的变化，作出如实而敏感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是实现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的前提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绕开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即原封不动地保留传统的以指令性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管理型体制，孤立地进行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也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这是因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为的是使作为农村经济细胞的承包户，真正地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但是，倘若以指令性为核心的传统的宏观调控机制原封不动，微观经济愈活跃，宏观控制就得愈死，即必须更多地借助于行政手段，强化指令性调控，而其结果必然障碍承包户向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方向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都说明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与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既然我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是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定“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化模式，重新构造我国农村微观经济基础，这就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因为以“政社合一”为特点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是一种纵向的、封闭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既不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不

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它一方面担负着维护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与利益结构；另一方面又有与行政指令相联系的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物资流通体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政策制度的配合与支持。因此，伴随着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势必将冲击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相互依存的整个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并要求城市的改革必须同农村的改革相协调，以便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这就要求在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同时，也要促使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

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与微观经济活力的增强，其结果必然使市场机制对农户行为的指导作用，有了显著的强化，农民为适应市场需求而生产的积极性日益高涨。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农村经济的非农业化（这两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的价值观念、成本观念、盈利观念也必然随之强化。与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相联系的农村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对资源的配置与劳力的需求，也必然会展开剧烈的竞争，并将促使农民把愈来愈多的注意力，放在权衡比较利益的高低上来。一旦经济运行机制演变到这个阶段，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有一本投入产出帐。虽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来不及从理论上弄懂什么是价值规律，但他们对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反应则是很敏感的。在这种背景下，市场的发育与健全，以及市场机制的形成，必然愈来愈上升为必须加以解决的主要矛盾。由此决定了，改革农产品购销与价格体制，也就成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中心环节之一。因为我国现行的农产品价格体系，以及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价格体系，形成了严重的价格扭曲，给农户造成了极不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承包户被迫在不平等的经营条件下进行生产。这就必然

严重地挫伤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而为了因势利导地解决这个矛盾，客观上要求加快实现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

简单地说，我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主要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即通过实行家庭承包制，把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使每一个家庭由过去的单纯消费单位，变成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把农户推上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实现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对商品流通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即生产自主权与交换自主权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光有生产自主权而无交换自主权，这种生产自主权是不完整的，更谈不上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这就要求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生产领域深入到流通领域，以利于解决微观搞活与宏观控死之间的矛盾。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同时取决于流通过程。虽然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却必须通过流通环节来实现。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究竟能不能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流通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我国农村经济向着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化时，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就不能再继续沿用过去长期实行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而必须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引导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其和国家制定的宏观目标一致起来，这就必须在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同时，因势利导地促使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开展的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即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至今还远未达到既定的目标，而我国农村第二步改革（即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也已进行了六年多的时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与第二步改革

之间的密切依存关系；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前既要继续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尚未完成的任务，又要深入进行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有把这两部分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协调地进行，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以健全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目标的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艰巨性，集中地表现在健全与完善集体统一经营以及相应地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比起建立家庭分散经营的这一经营层次，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主要内容——实行家庭承包制，不是采取真正意义上的联产承包，而是采取大包干即包干到户的形式。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是有一定的质的区别。在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下，承包者是在集体统一安排的生产经营计划下从事活动的；承包者使用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由集体提供的，生产费用也是由集体按承包基数支付的；包产部分的收获物，要如数上交集体，由集体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按规定比例奖给承包者，减产则按规定扣罚承包者的劳动所得；集体主体是一个统一核算与统一分配的单位，集体统一经营在双层经营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很明显的。而在实行包干到户的情况下，承包户虽然仍旧承包耕种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但以往属于集体所有的耕畜、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则基本上折价转归农户所有，集体也不支付给承包户的生产费用，承包户只须完成合同规定的提留与定购任务（其数量与承包户的实际产量没有直接联系，故包干到户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联产承包），其余的产品和收入全部归承包户所有，承包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单位。家庭分散经营在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集体统一经营的从属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这就必然会弱化集体统一经营职能。

健全与完善集体统一经营以及相应地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之所以比起建立家庭分散经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第一步改革的目标），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即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社区性合作组织为依托、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也就是说，这种双层经营体制，说到底是与承包关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经营既包括承包经济，又包括自营经济，而且这两部分经济是融汇在一起的，构成了新型的家庭经济。但是，对于社区性合作组织来说，这部分自营经济的独立性是很强的，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集体统一经营的制约的。换一种说法，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所出现的新型社区性合作经济，其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是具有相对的性质，其制约度是比较低的，并不可能覆盖农户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演变的趋势看，双层经营体制中以村为载体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和以户为载体的家庭分散经营层次，是辅以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即村级集体经济实体与农户家庭经济实体。而家庭经济又是由承包经济与自营经济两部分结合而成的。相对于承包经济来说，自营经济受市场的制约度更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扩充性。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民所固有的两重性，即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将存在于很长的时间。这就决定了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特征的社区性合作经济，将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

为了使社区性合作经济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妥善调节集体统一经营职能与家庭分散经营职能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以及正确处理村级集体

经济与农户家庭经济的共同发展关系，把调动农民个人积极性与发挥集体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农户家庭经济的同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这是当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发点。如果在宏观决策导向上，不加控制地向着扩大家庭经营与发展家庭经济的方向持续倾斜，势必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社区性合作经济，这是当前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实现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目标的艰巨性，还表现在作为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统一经营，要能够有效地发挥对家庭分散经营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就必须有相当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基础；那种建立在集体经济实力脆弱基础上的集体统一经营，是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明显的效果的。因为这种条件下的集体统一经营，更多的是属于管理型的，而不是属于经营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健全与完善集体统一经营职能，与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统一经营职能的健全与完善过程，就是社区性合作组织集体经济巩固与发展的过程。这是当前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健全与完善集体统一经营职能的根本实质所在。

谈到这里，很有必要附带指出，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一种形式，不仅广泛地存在于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国家，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国家，这说明家庭经营形式存在的必要性，主要不是由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生产特点所决定。但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经营的内容、形式、规模、范围都会发生变化的。当前这种以家庭经营为主、集体经营为

辅的生产经营体制，是适应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今后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这种以家庭经营为主、集体经营为辅的生产经营体制，很有可能演变为以集体经营为主、家庭经营为辅的生产经营体制，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sup>①</sup>”，到了那个时候，则可以在公有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有利条件，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农工商各业的协调发展。

如果说，重新构造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任务是艰巨的，那么，实现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的任务，则就更加艰巨了。这是因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一个非农业部门相对扩张、农业部门相对萎缩的过程。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非农业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上，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随着对外贸易的更加自由，农产品生产与非农产品生产之间的国际分工，并不会随之不断扩大？为什么传统的农业国不把农业部门的产品，以日益扩大的规模持续地供给别的国家，以及当别的国家农业部门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急剧下降时，该国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的高比重？为什么农业部门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的下降趋势，是如此地普遍，既不集中于某些国家，又未幸免于另一些国家？答案就只能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与规律去分析。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非农业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农业部门的资源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从而导致农业资源占总资源的比

①《邓小平文选》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增加农业劳动者人均占有的资金量,就须要补充大量的再生资金。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特别是迅速发展着的制造业,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其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很大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必然是以不等价交换和强制征税的形式,从农业部门中转移过来的。这就使得明显偏低的农业比较利益愈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本质转换,即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换,并保持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相当困难的。

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计划地放开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是改革传统的农产品购销与价格管理体制,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本质转换的重要条件。但是,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各方面的承受力考虑,要全面放开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实现所有农产品的完全商品化,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还不成熟。这就只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放开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特别是对其中关系国计民生特别重大的农产品,例如粮食等,只能分两步走:即首先实现粮食的半商品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向着完全商品化转化。这就必须选择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即国家定购与议价收购,平价销售与议价销售两条流通渠道,作为其过渡形式。较之粮食统购统销制,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其历史进步性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与价格信号。引入市场机制与价格信号的本意,在于通过它来刺激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缓解粮食供求矛盾,搞活粮食产品流通。但是,在粮食购销“双轨制”中输入价格信号的同时,又会产生第三种信号,即国家定购价格与市场收购价格之间的“差价款”信号。这种“差价款”实际上表现为政府对粮食这一产品征收的“产品税”,即

具有税收的性质。这是一种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粮食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不过,这种以价格差价形式反映出来的粮食产品税,往往会带有“逆调节”性质。这具体表现在:粮食供求越紧张,粮食市场价格与定购价格相差越悬殊,粮食的产品税额就越大,农民完成粮食定购指标的积极性就越低;相反,粮食供求越趋于缓和,粮食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越接近(甚至前者高出后者),粮食产品税额就越少(甚至是负税),这时农民完成乃至超额完成定购指标的积极性越高。这是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不可避免会带来的消极作用。

近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从粮食统购统销制向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的转变,因粮食购销价格倒挂补贴所造成的国家财政压力,不但没有减轻过,而且还有加重的趋势。国家财政始终承受着保护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利益的全部重担,承受着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的全部风险。为了防止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的风险过份地倾斜在粮食生产者身上,国家不得不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支持国家定购价格的逐步提高,也就是把粮农收入的增长建立在国家“二级财政分配”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为了使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引向深入,政府又不得不逐步减少国家定购的粮食数量,增加议价收购的粮食数量(目前后者所占的比重已显著超过前者),从而导致国家定购与平价销售差额缺口的不断扩大。为了不损害城市消费者利益,国家定购与平价销售的缺口部分(即议购转平销部分),只能采取议转平补贴。所有这些,都会日益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粮食价格补贴已从1978年的10多亿元猛增到1990年的306亿元)。而一旦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无法再承受粮食购销与价格补贴的增长时,这种主要依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销售价格没有同步提高)的改革,势必

(下转第36页)

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既是由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良好立场维系的，又是由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能力维系的。人民既不需要腐败的党当领导，也不需要无能的党当领导。只有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是有能力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才信赖党，跟党走。人民政权建立后，人民的根本利益已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上。因此，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能力，很大程度表现在领导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证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有为人民谋利益的能力，才能证明党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党才有良好的形象，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否则，党的形象只能是一个无能的形象，甚至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寻找别的领导力量。这点，我们从一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希望上级以至中央派干部更换没有能力领导经济建设的领导者中可以得到启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中获得教益。

### 五、只有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得到利益，党群关系才不怕敌对势力的挑拨离间。

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随时都面临着“第三者的插足”，这就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拨离间。从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看，敌对势力的挑拨离间，除了抓住共产党内的某些

（上接第58页）

很难再深入进行下去，更谈不上有可能加大改革的份量。

尽管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还面临着重重的困扰，但唯一的出路只能把这场改革坚定而又谨慎地进行下去。如果因为遇到某些阻力，而把改革中途停顿下来，甚至倒退到全面垄断的旧体制，除了导致粮食供求关系的更加紧张，再也不可能会有更好的后果。何况，高度集中统一的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瓦解，家庭承包制的全面推广，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不仅有当农

腐败现象大做文章外，就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暂时赶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尤其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煽动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引诱群众相信，用资产阶级政党取代共产党，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更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利益。在这样的煽动下，一些群众离共产党而走，一些群众摇摆不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夺取了政权。这一沉痛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要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抵御敌对势力挑拨离间，十分重要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提高幅度，最终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总之，发展生产力是解决党群矛盾、发展党群间血肉联系、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然，我们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同时，教育广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也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党、信任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

（作者单位：广西社科联

责任编辑：夏 日）

民的自由，同时也有不当农民的自由（即从事工副业的自由），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企图对粮食购销实行全面统购统销制，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1989年、1990年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的有利时机，并吸收副食品购销与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大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的份量，扩大粮食议购议销的比重，为最终向粮食购销与价格“单轨制”转变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刘 俊）